

苏洵的仕宦之路与书信书写

仲皓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0)

摘要: 苏洵科举不第转而通过举荐入仕, 书信在苏洵向朝中要员求荐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政治功能。这些书信既是苏洵自我认知和政治抱负的剖白, 也间接反映了仁宗朝后期的政治动向和用人需求。苏洵在蜀隐居的经历使他在求荐信中塑造了一个满腹韬略、为朝廷排忧解难但不囿于流俗的隐士形象, 这种形象建构的背后实则是北宋士人渴望加入政治序列, “得君行道”的普遍理想。

关键词: 苏洵; 书信书写; 举荐制; 由隐入仕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66 (2019) 10000507

北宋的举荐制度下, 出现了一批科举不第转而通过举荐入仕的士人群体, 苏洵就是其中一个。不同于二子在弱冠之年就高居榜首, 苏洵29岁方才参加科举, 50岁入朝为官。其间, 苏洵在家乡度过了近十年潜心学术的时光, 这不仅为他后期到京城的投献积累了才学和名望, 也让他在求官过程中一直以隐士自处。本文从书信的角度考察苏洵的求官历程。书信写作往往出于双向考虑, 既要抒写自我, 又要考虑自身与对方的关联。苏洵为求荐而作的一系列书信可以视为他对庆历到嘉祐年间政治动向的一种呼应, 从中不仅可以听到苏洵自身个性的强音, 也能听到庆历新政的余音在仁宗朝后期的回响。

一、苏洵的入仕历程

《宋史·文苑五》有载: 苏洵“年二十七始发奋为学, 岁馀举进士, 又举茂才等, 皆不

中”^[1]。景祐四年(1037), 苏洵东出三峡, 经由荆楚至京师参加贡举, 景祐五年落第, 沿嵩山、华山越秦岭返回蜀中。庆历四年、五年(1044—1045), 苏洵游学四方, 其间曾与郫县张俞隐居青城山, 后者也是西蜀有名的隐士。庆历六年(1046)苏洵举茂才不第又开始游历四方, 后因父亲去世, 归蜀居丧。此后, 苏洵尽焚旧稿, 闭户读书, “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 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 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 得其精粹, 涵蓄充溢”^[2], 最终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纵横捭阖的文风。

两次贡举落榜, 加之年龄较大, 苏洵放弃了通过科举入仕的常规道路, 带着自己所著的策论, 求访州郡长官, 希望通过举荐入仕。当时, 雷简夫知雅州, 接受苏洵来访后大为赞叹, 认为苏洵有王佐之才, 史迁之笔。雷简夫原是长安布衣, 经丞相杜衍举荐为官, 应是非常了解怀才之

收稿日期: 20190518

作者简介: 仲皓(1996—), 女, 辽宁营口人。厦门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唐宋文学。

人渴望知遇的心情。因此他不仅建议苏洵将文章投献给韩琦等朝中要员，还亲自向张方平、韩琦、欧阳修致信推荐苏洵。其实早在雷简夫向张方平致信之前，张方平已经荐苏洵为郡学官，只是例检繁多，久未上报，雷简夫便在信中替苏洵道出“洵望明公之意，亦不只一学官”^[3]。并望张方平多费心力，“荐洵之状，至于再，至于三”^[3]。

嘉祐元年（1056），苏洵随二子入京应试。在京其间，苏洵分别致书求访韩琦、富弼、田况、欧阳修等人，其后附上自己所著的《权书》《衡论》《几策》。欧阳修将其策、论转献于上，苏洵由是名满京师。但此时苏洵处于名气很大却无官可做的尴尬境地，而且不巧的是，嘉祐二年（1057），妻子程氏去世，苏洵只得携刚刚进士及第的苏轼、苏辙仓促返蜀。

居蜀其间，朝廷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以疾病为由，推辞不试。后因欧阳修等股肱之臣在朝内着力推荐，加之益州路转运使赵抃以地方牧守身份保举，嘉祐五年（1060），苏洵除试秘书省校书郎，其后寄禄文安县主簿，与陈州项城县令姚闾同修太常因革礼，书成而终。

纵观苏洵的求官历程，可以以嘉祐元年（1056）入京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从两次科举不第到至和三年（1056），苏洵潜心于学术，或四方游历，或隐居求志，在蜀地颇有名气。苏轼在《答任师中、家汉公》一诗中有过相应描述：“先君昔未仕，杜门皇祐初。道德无贫贱，风采照乡闾。”^[4]苏洵和地方长官雷简夫交游时，曾向后者呈过纳拜书，其中写道“某与执事道则师友，情则兄弟，伛偻跪拜，抗拜于两楹之间，而何以为亲？愿与执事结师友之欢，隆兄弟之好。”^[5]张方平也在《文安先生墓表》中提到他知益州时若想让苏洵来访，首先要礼数周备。^[6]可见在蜀地时苏洵处于备受尊重的状态，也非常看重交游双方的平等关系，这种行事风格与苏洵的隐士身份密不可分。

到了汴梁，处境便不同以往。京城是政治文化中心，是科举考试和官员调集的场所，汇集了各领域最优秀的人才，也不乏四处奔走求荐的士人。嘉祐元年入京之后，苏洵的拜谒并不是一帆

风顺的，其中夹杂着谦卑与辛酸。他在《上张侍郎第二书》中记录张方平回京时自己曾去途中迎接。当时正值隆冬风烈，苏洵冻得面无人色，半路看见工部侍郎宋祁的车马经过，仆从环绕，足声如雷，苏洵惊愕下马，立于道周，待宋祁车队远去才敢缓缓离开，由此自伤不已。又有《上欧阳内翰第二书》的末尾，苏洵恳求欧阳修接受自己的求访“惟其愚而不顾，日书其所为文，惟执事之求而致之。既而屡请而屡辞焉，曰‘吾未暇读也。’退而处，不敢复见，甚惭于朋友，曰‘信矣，其戏也！’”^[7]可知其初入京城时的求荐并不容易。但即便这样，苏洵要求双方平等交游的处世风格仍然没有发生变化。

二、“以学入仕”的路径选择

书信不同于其他文体，其特质是它明确地预设了读者，对方的身份地位，与自己的亲疏远近是重要考量因素，书信写作也因此带有强烈的指向性。期待被举荐的苏洵必然要知道身处权力中心的要员们希望为朝廷招纳一些什么样的人才，而他也要在书信中努力做出证明，自己就是这样的人才。因此苏洵为求荐而作的一系列书信，也可以视为他对庆历到嘉祐年间政治动向的一种呼应。

苏洵的投献主要从嘉祐元年随二子入京应举开始。在此之前，科举的侧重点经历了从诗赋到策论的转变。

庆历四年，朝廷对贡举科目中诗赋、策论的次序展开了一系列讨论，时任谏官的欧阳修上书提出，先考察策论，淘汰一大批文辞鄙恶、文理不通或理识乖诞的，减少备选人数，再考察诗赋，提高选举质量。同时他强调，只要策论可观，诗赋不工者也可以中举。宋祁等人也认为先策论，后诗赋可以转变学风，让雕琢文辞的人留心于治乱之法，让死背经文的人通晓圣贤大义。其后的诏书中“先策论则辨理者得其说，简程式则宏博者可见其材”^[8]等言语，也印证了策论的地位得到了官方认可。

在渴求改革的知识分子眼中，策论不仅仅是一纸文章，它们代表着一个人对国计民生的理解与反思，提供着革除政治弊病的良药。更重要的

是，他们需要从举子的策论中寻找政治同盟，为己所用。

但实际情况却是科场中所作的策论大多因循蹈袭，才识兼备、观点鲜明且文风畅达者少之又少。欧阳修也在奏议中感叹“往时自国家下诏书戒时文，讽励学者以近古，盖自天圣迄今二十余年，通经学古、履忠守道之士，所得不可胜数。”^[9]为了满足朝廷的用人需求，大量隐逸贤被荐举为官，这也是苏洵选择的路径——以学入仕。

苏洵通过投献策论向朝中要员传递自己的政治理念，于前必会附上表明心迹的书信，这些书信可以较为完整地还原出苏洵的求荐历程和思想状态。

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苏洵写到自己平生仰慕而不得见的有六人：范仲淹、尹洙、余靖、蔡襄、富弼、欧阳修。这些人曾是庆历新政的主导力量，新政失败后他们离散到地方任职，嘉祐年间又重新当权，其中欧阳修还主持了嘉祐二年的贡举。

包弼德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中总结了这六个人的共同点，他们不仅是政治家，同时也是学者。他们被任命为学士、知制诰，又不会被排斥在枢密院和三司之外。他们通过学者的路径进身，与皇帝直接接触，辅助国家政策的制定。他们本身又是奖掖者，奖掖有志向的后生通过“学”和“写”晋升。^[10]

正如苏洵在信中写的那样，这些人中，范仲淹、尹洙已经去世，余靖、蔡襄在地方任职，富弼身居宰辅之位不能轻易接见布衣，因此苏洵在京拜谒的首选就是热衷举荐有才之士，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

欧阳修当时已是公认的文坛领袖。苏洵对欧阳修的第一次投献以古文为切入点，在信中，苏洵对孟子、韩非子、欧阳修、李翱、陆贽的文章风格一一评点：

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鼉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

文，纤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舒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简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让，有执事之态。陆贽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当，有执事之实。而执事之才，又自有过人者。盖执事之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11]

在这一段论述中，苏洵把欧阳修的文章和孟、韩、陆、李四家对比，向欧阳修展现了自己对其文章的理解和认可，增强对方了解自己的意愿。更重要的是，苏洵对每一家的评语代表了他的古文欣赏水准。随后苏洵讲述了自己求学和为文的经过，并献上《洪范论》《史论》，通过把欧阳修引为文章知己进而获得长期交际的机会。这封信的成效非常明显，欧阳修将苏洵的策论上呈朝廷，并在《荐布衣苏洵状》中写道“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几策》20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9]苏洵的策论正是欧阳修所渴求的，不仅有文采，而且有裨益于政治。

欧阳修的推荐使苏洵在公卿之间名声大振，为苏洵后续的求访和入仕奠定了基础。不过对苏洵而言，古文才华只是敲门砖，他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举荐入仕参与政治筹谋，而非做一个文学家。苏洵致信求访韩琦、富弼、文彦博时，便不以论文学为旨归，不再评点文章风格，而是直指社会弊病，提出兴革之法，以彰显自己的政治才能。他劝韩琦严肃军纪，执法不求情；委婉批评富弼身在丞相之位无所兴革，劝他“忍其小忿以容其小过，而杜其不平之心”^[12]；建议文彦博以“略于始而精于终”^[13]的原则广收天下之士、提高行政效率。由此可见，苏洵虽在蜀隐居十年，研究诸子经义，但并未与外界隔绝，他始终对朝中局势、政治弊病保持敏锐观感。

三、苏洵隐士身份下的书信书写

《宋代的隐士与文学》一书中，刘文刚先生认为“隐”，包含“隐士”和“隐逸”两层含义：

隐士窄的含义是隐居山林的士，隐逸是比隐士更广泛的一个概念，凡是不愿做官的行为，官吏入仕前的读书生活，落职闲居，休退，皆可成为隐逸。^[14]

苏洵应举不第后在乡十年，精研学术，属于广义的“隐”，这段经历在他后来的求荐书信中多被提及，也让他一直以隐士自许。这一身份下，苏洵既要求荐入仕，又要保全山林之士的矜持高贵，加上他自身刚毅木讷的性格，这些因素让苏洵的书信呈现出不同于普通干谒信的样态。

在求荐的书信中，苏洵文风一如他的策论，气势如虹又间有顿挫，既显露自身才华，又绝不摧眉折腰，这在他致田况的《上田枢密书》表现得最为明显。

信中开头一番论述排闼而来，把“得志于时”上升到顺应天意的高度，认为天分降临到一个人身上，不是偶然，必是让人有所作为的。如果不好好利用上天赋予的才华，就是“弃天”，卑躬屈膝求取别人赏识就是“褻天”。但如果自己珍惜才华并积极进取，却仍不为世所用，那错就在于对方不能慧眼识珠，对方就是在“逆天”而行。苏洵用细密的逻辑把举荐自己推演成田况必须履行的职责，与书信结尾的“若夫其言之可用与其身之可贵与否者，执事事也，执事责也”相呼应。^[15]这种把一个具体问题抽象化并上升到大道伦理层面的写作手法，在苏洵的策论中屡屡可见，这种写法也被运用在书信之中，使内容更有煽动性，以提高他获得对方举荐的可能。

在对天赋的论证之后，苏洵介绍自己为学为文的经历“今洵用力于圣人、贤人之术亦久矣。其言语、其文章，虽不识其果可以有益于今而传于后与否，独怪其得之之不劳。方其致思于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书之纸也，若或相之。夫岂无一言之几乎道？……数年来退居山野，自分永弃，与世俗日疏阔，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诗人之优柔，骚人之精深，孟、韩之温淳，迂、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投之所向，无不如意。”^[15]言语中对自己的才学自信满满，尤其是“独怪其得之之不劳”、“投之所向，无不如意”等言语还带着些夸耀的成分。

如果说书信前半部分对才华和天赋的展露成攻势，后半部分则可视守为守势，道出自己并非没有退路，仅仅是希望才能得到发挥，并再次强调对方的举荐对自己的重要性。这种锋芒和谦逊的错落是苏洵由隐求仕的重要策略。

其中有一句“洵有山田一顷，非凶岁可以无饥，力耕而节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与者不忍弃，且不敢褻也。”^[15]这种对田产和能够自给自足的强调在他的多封求荐信中出现，这和宋代隐士的生活追求不无联系。

随着经济的发展，宋代不同于前代主张清贫的隐逸传统，他们更加注重物质生活的舒适，主张在田产富足、独立谋生基础上的隐逸。有了田产，便不需要为口腹奔忙，能够在人格上获取更多的自由，也为艺术的精进准备了物质基础。富足的田产是苏洵在京投献时人格独立和峻峭傲骨的底气和资本。同时，对田产的用笔也把苏洵和那些流连于公卿之门求取经济援助的举子区别开来，以表明自己的投献是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非求财。

在士人干谒的过程中，求荐者会因为政治地位差距放低自身姿态。我们常会在干谒信中看到一个个战战兢兢等待对方垂青的士人形象，但苏洵在求荐包括后续走访的过程中，极其看重自身的独立人格，并明言希望对方以礼相待。这一点，苏洵与在蜀地时别无二致，并没有因为在京城位卑言轻而自降身份。

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苏洵在称赞欧阳修的古文之后写道“夫誉人以求其悦己，洵亦不为也，而其所以道执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执事之知其知我也。”^[11]他特别强调自己这些评价只是希望欧阳修对自己的才华抱负有所了解，并不是夸大其词去谄媚对方、讨好对方，表明自己不屑于用这种虚浮的方法求取名利。

这种夹杂在渴求知遇中的自持与疏离在苏洵获得官位之后仍然明显。

一般而言，主考官和举子，举荐者与被推荐者会形成不言自明的“座主门生”关系。尽管朝廷屡屡禁止，这种出于本能的政治抱团私下里从未停歇。被朝廷任用后，苏洵在给张方平和欧阳

修的书信中默认了这种关系，但相较于致谢和表示追随，他更强调彼此之间是君子之交。

在《上欧阳内翰第五书》中，他写道：

然君子之相从，本非以求利，盖亦乐乎天下之不知其心，而或者之深知之也……。洵不以身之进退出处之间有谒于执事，而执事亦不以称誉荐拔之故有德于洵。再召而辞也，执事不以为矫，而知其耻于自求；一命而受也，执事不以为贪，而知其不欲为异。其去不追，而其来不拒，其大不荣，而其小不辱。此洵之所以自信于心者，而执事举知之。^[16]

苏洵在这封信中明言，两人虽是举荐者与被举荐者的关系，但两人的交际是出自理解与欣赏。欧阳修举荐苏洵是为国家发掘人才，就像他在《荐布衣苏洵状》中写的“荐贤推善”，“为时得士，亦报国之一端”，^[9]苏洵获用是因为自身才学过人，两人都是为了裨益朝政，没有私利交易。

益州路转运使赵抃曾以地方长官的身份推荐苏洵，而后苏洵在《谢赵司谏书》一方面感谢这位之前不相识的长官的举荐，另一方面提出“然犹以素不相识之故，得免于希势苟附之嫌，是其不识贤于识也。”^[17]他反对以频繁拜访、写信表示亲厚的世风，认为诚心相知不需要流于形式的礼节。

这种直白坦荡的态度和对虚浮礼节的不屑使得苏洵即使辗转求荐，也未减损半分山林之士的风骨，所以从外部看来，苏洵的求荐之举与他的隐士身份并无龃龉之处。

四、苏洵以隐士身份求荐的深层内涵

刘文刚先生在《宋代隐士与文化》中统计出了隐逸文学中使用频率最高的11个字，分别是逃、贫、慵、狂、拙、独、耕、读、醉、足、乐。这11个字基本囊括了表现隐逸生活、塑造隐士形象的常用意象，但这些词很少在苏洵的诗文中出现。

这里便出现了一个内部矛盾，苏洵在书信中

标榜自己的隐士身份，与公卿的来往中不敛锋芒，但从苏洵可查的全部作品中，较少有表达隐逸情趣的诗文。由此，我们可以作出这样一个论断：苏洵对隐士身份的重重大于他对真正隐逸情趣的追求，他的隐逸只是谋求出仕的外衣。

正因为隐士的身份，苏洵在求荐的过程中，被当成出世遗贤来看待，而非需要取悦考官的举子。这使得他可以游离于官僚体制之外，不受世俗权力的规训，在保全独立人格的前提下，向朝中要员建言献策，通过他们践行自己的政治观念。

嘉祐二年的《上韩舍人书》中，面对韩绛^{[18]350}的约请，苏洵在回信中没有冗陈的感激，而是先道出当前政治弊病，和朝中“自两制以上宜皆苦心焦思，日夜思念，求所以解吾君之忧者”^[18]的局势，把自己定义成朝廷的解忧之人。继而形容自己的状态“洵自惟闲人，于国家无丝毫之责，得以优游终岁，咏歌先王之道以自乐，时或作为文章，亦不求人知。以为天下万事，而王公大人岂暇见我哉？是以逾年在京师，而其平生所愿见如君侯者，未尝一至其门。”^[18]这当然是不符合实情的，只是苏洵作为隐士的自我标榜，有了这层身份加持，布衣出身的他才得以要求官员们以礼相待。他提出自己已经“闲居十年，人事荒废，渐不喜承迎将逢，拜伏拳踞”^[18]，希望两人相见时可以抛下身份地位差异带来的束缚，免去诸多礼节，从容对坐，只有这样他才愿意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为朝廷排忧解难。

苏洵强调自己贯通经史诸子又不在朝为官，无需畏惧天子和宰相的威严，可以用一种旁观的视角直言政治弊病，贡献兴革之法。这种方式在致文彦博的信中也曾用到，他在上陈建议后说自己“不见用于当世，幸又不复以科举为意，是以肆言于其间而可以无嫌。”^[13]

通过这种方式，苏洵把自身处境从渴求入仕的布衣转化成为公卿排忧解难、出谋划策的高士，使得年近五旬仍在求官的自己不致过于窘迫。

苏洵初期的投献加之欧阳修等人的推荐，在嘉祐三年（1058）得到了反馈。当时苏洵以妻丧在蜀，推辞了试舍人院的诏令。从目前可查的书信中，除了《上皇帝书》中以疾病为托辞，另有

四封书启提及了他推辞召试的缘由，四封书启收信者都是他的举荐人，分别是雷简夫、梅尧臣、欧阳修和富弼。因四人地位相异、亲疏有别，书启中道出推辞的缘由也不尽相同，归纳起来，至少有三个原因。

最直接原因是经历过两次科举失败的苏洵担心去应试不能合考官的心意，认为自己献上的策论足以代表自己的才学，没有必要再去应试。

再则苏洵当时已经年逾五旬，他的年龄和作为隐士的自持不允许他一经诏令就从蜀地千里迢迢去京城应试，若是那样，他和追名逐利之辈又有什么区别？他在《与梅圣俞书》中写道：

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万里以就试，不亦为山林之士所轻笑哉。自思少年尝举茂才，中夜起坐，裹饭携饼，待晓东华门外，逐队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据案。其后每思至此，即为寒心。今齿日益老，尚安能使达官贵人复弄其文墨，以穷其所不知邪？^[19]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苏洵对此次召试的原因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上皇帝书》中直言“陛下虽以此召臣，然臣观朝廷之意，将以其文采词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20]可见苏洵知道朝廷录用自己只是因为古文可观，朝廷只是需要他做一个文学侍从，这和苏洵对自身的期待相隔甚远。当然这个结果早已埋下伏笔，嘉祐元年，在欧阳修写给富弼的信中，苏洵是这样被介绍出场的“有蜀人苏洵者，文学之士也。”^[21]

苏洵的《衡论》其中一篇名为《育才》，文中他建议朝廷优待奇杰之士，给他们隆重的恩典，赐予高官厚禄，包容他们的个性，这样他们才能更好地贡献自己的才华。

苏洵当然希望自己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优待，但他的理想并没有实现。第二次诏令颁布下来，他只得了一个试校书郎的官职。在嘉祐六年（1061）给韩琦的信中，苏洵陈述自己当下的境况“劳筋苦骨，摧折精神，为人所役使，去仆隶无几也。”^[22]这样卑琐的职务对于要求“从容坐隅，时出其所学”的苏洵而言无疑是一种幻灭，

不仅是对他隐士身份的讽刺，也让他革除政治弊病的理想委于尘土。因此他向韩琦宣告自己正在写作的《易传》将会是卓越的学术成就，待到书成，他就无需在这样一个小职位上流连，言下之意却是请求韩琦为他改换职位。最后，苏洵获得了编修太常礼的工作，他也在修礼的过程中实现了参与政治、劝谏君王的初衷。

通过对上述书信的考察可以得出，苏洵对隐士身份的强调、对常规官僚风气的游离、对交游平等的要求，包括他拒绝做文笔侍从，并进言朝廷优待奇杰之士，都是为了让他言论在陈规阻力和重臣权威之下仍有被认同和被实践的可能。

换言之，苏洵希望求取的不在于某一个具体官职，而是真正加入政治序列，参与到社会体制的建构中去。这也是北宋文官政治下士人的普遍诉求，即通过“共定国是”、“得君行道”把所学转化为所用，以此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23]

书信在苏洵入仕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政治功能，既是苏洵自我认知和政治抱负的剖白，又间接反映了仁宗朝后期的政治动向和用人需求。同时，苏洵基于隐士身份辗转求荐，在求荐信的行文中表现出高度自持而不敛锋芒，呈现出不同于普通干谒信的状态，有助于考察隐士这一群体通过举荐制入朝的心理动向。苏洵在书信中塑造了一个满腹韬略、为朝廷排忧解难但不囿于流俗的隐士形象，这种形象的建构并不出于其隐逸情趣，而是出于北宋士人渴望加入政治序列，“得君行道”的普遍理想。

张方平在《文安先生墓表》中写道“先生亮直寡合，有倦游之意，独与其子居，非道义不谈。至于名理称会，自有孔、颜之乐，一廛一区，侃侃如也。”^[6]欧阳修也为苏洵作墓志道：“既见而温温似不能言；及即之，与居愈久，而愈可爱。”^[2]苏轼在《颍州初别子由》中指出子由性格“木讷刚且静”^[24]，最似其父。通过上述书信辅之这些表述，我们大致可以还原出苏洵的形象。他的生活并不一定像他的文章那样畅达肆意，他是一个辗转求官的老者，一个志在仕宦的隐士，一个静穆执着的文人，是那个时代致力于建立理想社会秩序士人中的一份子。

参考文献:

- [1]脱脱 等. 宋史卷四百四十三[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13093.
- [2]欧阳修. 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并序[M]//曾枣庄, 金成礼. 嘉祐集笺注·附录一.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520.
- [3]雷简夫. 上张文定书[M]//曾枣庄, 金成礼. 嘉祐集笺注·附录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754.
- [4]苏轼. 苏轼诗集: 卷十五[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537.
- [5]苏洵. 与雷太简纳拜书[M]//曾枣庄, 金成礼. 嘉祐集笺注·佚文.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480.
- [6]张方平. 文安先生墓表[M]//曾枣庄, 金成礼. 嘉祐集笺注·附录一.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522.
- [7]苏洵. 上欧阳内翰第二书[M]//曾枣庄, 金成礼. 嘉祐集笺注: 卷十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335.
- [8]宋会要辑稿·选举三[M]. 徐松 辑, 刘琳, 刁忠民, 舒大刚 等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5300.
- [9]欧阳修. 荐布衣苏洵状[M]//欧阳修全集: 卷一百一十二.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1698.
- [10]包弼德. 斯文: 唐宋思想的转型[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 197.
- [11]苏洵. 上欧阳内翰第一书[M]//曾枣庄, 金成礼. 嘉祐集笺注: 卷十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328329.
- [12]苏洵. 上富丞相书[M]//曾枣庄, 金成礼. 嘉祐集笺注: 卷十一.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309.
- [13]苏洵. 上文丞相书[M]//曾枣庄, 金成礼. 嘉祐集笺注: 卷十一.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313314.
- [14]刘文刚. 宋代的隐士与文学[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2: 自序.
- [15]苏洵. 上田枢密书[M]//曾枣庄, 金成礼. 嘉祐集笺注: 卷十一.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318319.
- [16]苏洵. 上欧阳内翰第五书[M]//曾枣庄, 金成礼. 嘉祐集笺注: 卷十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341.
- [17]苏洵. 谢赵司谏书[M]//曾枣庄, 金成礼. 嘉祐集笺注: 卷十三.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368.
- [18]苏洵. 上韩舍人书[M]//曾枣庄, 金成礼. 嘉祐集笺注: 卷十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349350.
- [19]苏洵. 与梅圣俞书[M]//曾枣庄, 金成礼. 嘉祐集笺注: 卷十三.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360361.
- [20]苏洵. 上皇帝书[M]//曾枣庄, 金成礼. 嘉祐集笺注: 卷十.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292.
- [21]欧阳修. 与富文忠公六通[M]//欧阳修全集: 卷一百四十四.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2350.
- [22]苏洵. 上韩丞相书[M]//曾枣庄, 金成礼. 嘉祐集笺注: 卷十三.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352.
- [23]余英时. 中国文化史通释[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28.
- [24]苏轼. 苏轼诗集: 卷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279.

The Political Career and Letter Writing of Su Xun

ZHONG Hao

(School of Humanit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0 ,China)

Abstract: After successively failing to pass the highest level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u Xun turned to acquire an official position through the recommendation of celebrities. Letter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during his visits to higher level officials. These letters not only reveal Su Xun's perception and ambition, but indirectly convey political trend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Reign of Ren-Zhong. Su Xun was secluding in Sichuan for nearly 10 years. So the character as a hermit who is talented but indifferent to fame can always be found in his letters. This resulted from the common value of scholars in Northern Sung Dynasty, that is, to establish an ideal political system.

Keywords: Su Xun; Letter Writing; Recommendation;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as a Hermit

【责任编辑、校对: 王兴全】